

現代新儒家學案

方克立 李錦全 主編

B26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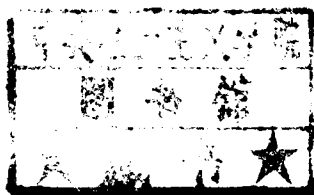
94191

0625/02

現代新儒家學案

中 冊

方克立 李錦全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DG25/02

中 冊 目 錄

馮友蘭學案 田文軍編撰 (1)

賀麟學案 宋志明編撰 (215)

錢穆學案 羅義俊編撰 (383)

馮友蘭學案

田文軍 編撰

目 錄

馮友蘭評傳	(5)
一、馮友蘭生平	(5)
(一) 耕讀人家 學子生活	(5)
(二) 與時偕行 為道屢遷	(10)
(三) 意寄三松 心懷四化	(14)
二、新理學的體系與結構	(19)
(一) 作為形上學的新理學 其相說	(19)
1. 實際與實際	(19)
2. 道體與乾元	(27)
(二) 文化建設與文化類型	(32)
1. 文化與文化類型	(32)
2. 文化類型與社會類型	(35)
3. 中國文化發展與文化類型轉變	(37)
(三) 人生境界論	(41)
1. 文化與人	(41)
2. 道德的普遍與特殊	(44)
3. 人生價值與人生境界	(47)
(四) 新理學方法	(50)
1. 命題分析與邏輯證明	(50)
2. 直覺體認與主觀領悟	(56)
3. 新理學方法的特色與實質	(58)
三、新理學的理論價值和歷史作用	(62)

馮友蘭新儒學思想資料選輯	(67)
一、論事物的共相與殊相	(67)
(一) 理 太極	(67)
(二) 氣 無極	(85)
(三) 新理學問答之一	(98)
(四) 新理學問答之二	(107)
二、關於中西文化比較與中國文化建設	(114)
(一) 論“比較中西”	(114)
(二) 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	(119)
(三) 人生哲學之派別	(125)
(四) 別共殊	(128)
(五) 論文化互補	(137)
三、論人生與人生境界	(141)
(一) 覺解	(141)
(二) 境界	(150)
四、關於哲學與哲學方法	(157)
(一) 什麼是哲學	(157)
(二) 哲學與科學	(159)
(三) 哲學的任務	(161)
(四) 論形上學的方法	(162)
(五) 新理學方法	(173)
 馮友蘭論著編年目錄	 (182)

馮友蘭評傳

一、馮友蘭生平

(一) 耕讀人家 學子生活

20世紀20年代以來，由於中國社會和文化處於劇烈地動蕩變更之中，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力圖以服膺宋明道學，融合中西文化的方式復興中華文化，促進中國文化現代化，在中國現代史上，興起了一股頗具特色的文化思潮——新儒學思潮，馮友蘭先生即是這一思潮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馮友蘭，字芝生，生於1895年12月4日，河南省唐河縣人。馮家原籍山西高平，祖輩經商，遷徙至唐河祁儀鎮落戶，到馮友蘭祖父馮玉文理家時，馮家已有1000多畝土地，這樣的經濟條件，使馮家子弟受到了較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在馮玉文的子女中，長子雲異、三子漢異是秀才、二子臺異為清光緒戊戌科進士。馮臺異有二子一女，長子即馮友蘭，二子名景蘭，女名淑蘭，又名沅君。馮友蘭出生在這樣一個傳統文化氣氛很濃的人家，從小即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同舊時中國農村較為殷實的人家的孩子一樣，他先入家塾，讀《三字經》一類幼學讀物，後漸及《四書》、《詩》、《易》、《左傳》之類，少年時代基本上是在家塾中度過的。

馮友蘭接受教育的過程，受到了他母親吳氏的深刻影響。馮臺異進士及第後，未能即刻做官，到武昌方言學堂謀事，得到了一個會計庶務員的職位，馮友蘭後來也隨母親來到了父親任所。在

方言學堂，馮臺異忙於公務，教養孩子的責任大都由其妻承擔，馮友蘭初讀《詩》、《易》就是在母親帶領下進行的。後來，馮臺異得了湖北崇陽縣令的職務，馮友蘭又隨父母到了崇陽。馮臺異署理崇陽縣政，時間很短，42歲時即病逝於崇陽任所，其時馮友蘭年僅13歲。馮臺異病逝之後，其子女的教養即全由吳氏操持。吳氏是一位精明干練的女性，她把孩子們從崇陽帶回唐河老家，一方面安排孩子們繼續入家塾學習，一方面千方百計讓孩子們進正規學校，使孩子們獲取正規學歷，以便維持馮家的“耕讀”傳統。就是這位吳氏夫人，不僅送兩個兒子出國深造，學有所成；而且讓女兒解除婚約，報考北京女子國文專修科，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學人。

1910年，15歲的馮友蘭離開家塾，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由於長期的家塾教育，這時候馮友蘭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初級中學的文化程度，從唐河高小畢業後，馮友蘭即以優異成績考入了開封中州公學。入學不久，由於爆發了辛亥革命，時局動蕩，馮友蘭又從開封返回唐河老家；第二年赴開封復學，又因中州公學教務不盡人意而轉學到武昌中華學校。馮友蘭入中華學校不久，上海中國公學開始在全國招生。中國公學是留日學生出於民族義憤而創辦的，學校推行自治，民主氣氛較濃，對學生注重新式教育，在青年學生中較有吸引力。當辛亥革命後，中國公學恢復招生時，社會上十分重視，河南省決定資助一批學生進中國公學學習，馮友蘭得知這一消息後，又放棄在中華學校的學習，通過考試，於1912年以河南官費生的身份進入中國公學，接受正規的中等教育。在中國公學，馮友蘭一方面繼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這時候他已開始購買二十四史一類大部頭的中國典籍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公學注重對學生的西學教育，馮友蘭在此不僅英文得到了提高，而且開始初步接觸西學，耶芳斯的《邏輯要義》他就是這時閱讀的，並由喜愛邏輯學引起了對哲理的興趣，產生了學習西方哲學的願望。

1915年，馮友蘭從中國公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法科。進北大後他改上文科，想實現自己系統學習西方哲學的願望，由於北大的西洋哲學門未正式招生，馮友蘭進了中國哲學門，他是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的第二班學員。

在北京大學的學習，對馮友蘭後來一生的學術活動和思想面貌影響深遠。進中國哲學門，對馮友蘭的學習趣向來說本是一次逆轉，但正是在中國哲學門的學習，使他從一個較高的層面上形成了自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結構。中國哲學門以中國哲學史、諸子學、宋學等為主要課程，馮友蘭對這些課程的學習，已不再單是讀書識字，而是從一個較高的層面上瞭解中國文化的歷史，中國文化的傳統、義蘊和價值。馮友蘭晚年回顧這一段學習生活時說：“我雖然沒有達到學習西方哲學的目的，但是在中國哲學這一方面，我卻是大開眼界。我開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論、試帖詩之類的東西，不過是應付科舉，騙取功名的一種工具，並不是學問；我雖然讀了一些古書，但是對於真正的學問還沒有入門，也不知道門在哪裏，現在總算是摸着一點門路了。”^①馮友蘭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圍繞着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清理和對中國哲學傳統的反思進行的，這種工作所必須具備的有關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知識，主要得力於在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的學習。

同時，在北京大學的學習，使馮友蘭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培養起他強烈的民族意識。馮友蘭進入北大的這一年，正值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誌》創刊。《青年雜誌》後更名《新青年》，作為革命的產兒，《新青年》的問世意味着人們對封建的舊文化的總攻擊的開始，標志着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馮友蘭進入北京大學的第二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並包”，使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等人先後進入北京大學任教，同時也延聘了一些主張舊學的代表人

① 《三松堂自序》第199頁，三聯書店1984年版。

物作北大教師，遂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胡適於1917年進北京大學任教，他用西方的學術方法講授中國哲學史，在北京大學引起震動。胡適講中國哲學史時，馮友蘭已經是高年級學生，但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也影響了馮友蘭，使他認識到給自己講中國哲學史的教師在方法上的陳舊，馮友蘭所受胡適的影響實際上是近代西方學術方法的影響。在陳獨秀、胡適一類人物在北京大學主張新文化的時候，梁漱溟在北大講授佛學、儒學，舉起了維護東方文化的旗幟，堅持東方文化特別是傳統的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和標準。梁漱溟弘揚佛學和儒學，是以東西文化對比的方式進行的，使馮友蘭一類青年學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加之陳獨秀一類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以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為武器，對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從正面展開直接猛烈地批判，更使得中西文化異同成為人們思考和議論的熱門話題。在這樣的學術氣氛中，馮友蘭逐漸意識到西方文化是一塊有別於中國文化的天地，人們探討中西文化問題，根源於近代中西文化的矛盾，根源於中西文化矛盾中中國文化的落後和中華民族的苦難。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去審視人們對中西文化異同優劣的議論，馮友蘭對胡適和梁漱溟等人的工作和思想並不完全滿意和贊同。在馮友蘭看來，胡適用西方近代的學術方法處理中國哲學史中的問題，讓人耳目一新，但對中國哲學本身的瞭解並不深刻，他講授的中國哲學史還停留在文字解釋和考證的層面；梁漱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有自己的理解，但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又太膚淺，這些都不能令人滿意。這種心情使馮友蘭在專攻中國哲學的時候，重新燃燒起系統學習西方哲學的強烈願望，追求一種兼綜中西的知識結構，以期對中西文化的矛盾和復興中國文化的道路作出自己的解答。這種思想和動機影響到馮友蘭後來全部學術活動。

1918年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未能得到即刻去繼續學習的機會，他來到開封，在一個專科學校任教，講授國文和修身。在

開封他和朋友們辦起了《心聲》雜誌，主張宣傳外界的新思想，這實際上把新文化運動的氣息帶進了開封。馮友蘭在開封任教時間很短，1919年他通過考試，作為河南官費留學生，於12月底抵達美國紐約，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

哥倫比亞大學是紐約的知識文化中心，這所大學以不拘傳統，注重自然、商業、歷史、行政管理和航空等學科而聞名於世。馮友蘭進校時，美國現代哲學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實用主義者杜威、新實在論者蒙塔古等都在該校任教，使馮友蘭直接受到了這些美國哲學家學術思想的薰陶，從馮友蘭後來的學術思想來看，在哥倫比亞大學，新實在論對他的影響最為深刻。他在此三年，系統地研習西方哲學，經受了西方現代哲學思維方法的嚴格訓練，使自己在熟知中國哲學的基礎上又具備了系統的西方哲學知識，形成了一種兼綜中西的知識結構。在研習西方哲學的過程中，馮友蘭並沒有放棄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而是力圖通過中西哲學的比較，去追求自己對中西文化比較的答案，並將自己的研究成果隨時反饋給國內學術界。在美國期間，他拜訪過印度詩人泰戈爾，和泰戈爾討論東西文化異同，並先後寫成《柏格森的哲學方法》、《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論比較中西》等交由北京大學學生刊物《新潮》發表，這些活動使“新潮社”在1920年宣布接納他為該社正式成員。馮友蘭通過對中國為什麼沒有形成類似西方的近代科學的原因的探討，比較了中西文化的深層內容：價值觀念和價值標準。通過擴展這種研究，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通過答辯後於1923年回國，1924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他哲學博士學位。

馮友蘭從接受啓蒙教育開始，到大學畢業，再進研究院深造，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的學生生活，這是一種典型的正統的學生生活。這種生活使他對中西哲學乃至整個中西文化都具有系統的瞭解和知識，造就了他會通中西的哲人才識和氣質，為他後來畢生從事以哲學史為中心的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準備了條件。

（二）與時偕行 為道屢遷

馮友蘭 1923 年回國之後，受聘為河南省中州大學文科主任兼哲學教授，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教授生涯。

1923 年 2 月 4 日，張君勱在清華學校作《人生觀》講演，4 月丁文江寫成《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一文，拉開了中國現代史上關於人生觀的論戰。馮友蘭這年歸國後曾赴山東省立六中講演，講稿為《一種人生觀》，192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決定將此稿作為《百科小叢書》中的一種出版。在《一種人生觀》中，他批評梁漱溟先生的直覺主義；同時認為一種完全的人生觀，應依據於一個完全的宇宙觀，並表示自己的人生觀所依據的宇宙觀尚未系統定型。這一年他的博士論文《人生哲學之比較研究》英文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來他又將英文改寫為中文，並加上《一種人生觀》的內容，以《人生哲學》之名在 1926 年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馮友蘭在中州大學任教時間不長，1925 年，他因為在中州大學爭取教務主任之職不成，自覺事功前途渺茫，離開中州大學，應聘赴廣東大學，在廣州他目睹了省港工人大罷工的壯觀場面，不久即離開了廣州，進入燕京大學任教。在燕京大學由於教學工作的需要，他開始《中國哲學史》的寫作和《莊子》郭象注的英文選譯工作。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大學校長。羅是“五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新潮社”的組織者之一，與馮友蘭在北大同學，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留學，在美時，常與馮友蘭等北大同學聚會。羅家倫入主清華，邀請了幾位北大同學參加自己的領導班子，馮友蘭是其中之一，他被聘為清華大學秘書長兼哲學系教授。

馮友蘭從 1928 年進入清華大學之後，一直在清華擔任重要的

行政職務。他辭去秘書長職務後，又擔任文學院長，哲學系主任等職。1930年羅家倫辭去校長職務，清華大學有十一個月沒有校長到任，馮友蘭以文學院長的身份擔任校務會議主席，和理學院長葉企孫一起“判行公事”，主持清華的日常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清華和北大、南開三校於1937年南遷至長沙，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由胡適擔任聯合大學的文學院長，胡適任職不幾月，即受南京政府委托出訪歐美，臨時大學又遷徙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文學院長，並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的文學院長、文科研究所所長，哲學學部主任等職。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清華遷回北平，恢復建制，馮友蘭繼續擔任文學院長，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這期間，清華校長梅貽琦於1948年離開大陸，馮友蘭又以校務會議主席的身份主持過清華校務，和全校師生一道迎來了清華和全國的解放，直到1949年4月，他才辭去了校務委員會主任、校務委員和文學院長等職務，專任哲學系教授。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清華哲學系合並到北大哲學系，馮友蘭從清華轉入北大，任哲學系教授。解放後，政府和人民也十分重視馮友蘭的工作，他被推選參加全國人民代表會議，被評為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一級教授，後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馮友蘭在解放前的清華大學這樣一所精英群集的高等學府裏，特別是在聚集了陳寅恪、朱自清、聞一多、楊樹達、吳宓、金岳霖等著名學者的文學院能長期處於領導崗位，解放後又繼續受到政府的關懷和重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學術活動，與時偕行，對現代中國的學術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1928年進入清華大學，到解放後的60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不斷變遷，學術成果最為繁富的時期。30年代馮友蘭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是他的《中國哲學史》。這部著作質重量巨，不僅運用現代的學術方法，從哲學的角度，剖析孔丘的正名，墨翟的功利，並辨析名家的“堅白同異之辯”，肯定公孫龍、惠施致思趣向有別；書中對王充的自然主義，佛教中思維路綫的差異，以及道

學家中程朱之間，朱陸之間的異同均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多發前人所未發，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馮友蘭通過對中國哲學的系統清理，斷言中國哲學尚停留在中古時期，中國還沒有產生類似西方的近代哲學，從而使他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認識更加具體化，為他繼續探討中西文化問題確立了一個新的認識的基點。

馮友蘭完成《中國哲學史》的寫作之後，轉向對解決中西文化矛盾的途徑，發展中國文化方向的理論探討，其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他從1937年在“親知南渡”、體驗“江山半壁”的悲涼的心境中開始寫作《新理學》，到1946年終於先後寫成了《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貞元六書”，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學思想體系。在新理學中，他繼承宋明道學中理學一派的傳統，沿着理學家的思想路數建立了自己的共相說，為自己的社會文化理論確立了一種形上學根據；同時，又以一種深沉的歷史自覺和民族責任感，把偉大的抗日戰爭看做中華文化復興的“貞元之會”，具體探討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認定中國文化的發展，必須經過產業革命，轉化為近代形態的文化。提出了自己既不同於“全盤西化論”、“部分西化論”，又不同於“本位文化論”的文化類型說。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學術成果除“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史》外，還有大量的論文。1946年清華大學遷回北平後，他將自己在抗戰年代寫成的其它文稿編成《南渡集》交商務印書館，後因故未能印行；1947年，他作為客座教授，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中國哲學史，講稿構成《中國哲學小史》，由美國麥克米蘭公司出版，此書還有法文、意大利文和南斯拉夫文本；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和《新原道》也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英國倫敦出版。他在三四十年的學術成果流譽國中，蜚聲海外，“使他成為抗戰期中，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

大的哲學家”。^①

由於學術成就卓著，馮友蘭曾先後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47年），印度德里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5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82年）。在國內，他在1935年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即當選為常務理事，第二年《哲學評論》正式成為中國哲學會會刊，他出任編輯委員會主任，主持這本三四十年代專門哲學刊物的編務工作。1943年中國哲學會第四屆年會召開，他繼續當選為常務理事。這屆年會上還成立了西洋哲學名著編輯委員會和中國哲學研究會，他又被推舉兼任中國哲學研究會主任。此後他利用中國哲學研究會的活動經費，組織過自己和熊十力先生的哲學著作的出版。

馮友蘭建構新理學體系的時期，是中國學術界思想十分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其它西方人文思潮在中國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人們又一次掀起了中西文化論爭的熱潮，更加急切地希望找到發展中華文化的科學道路。在這種時代氛圍中，馮友蘭十分關注國內外學術界的思想動向，注意吸收人文科學研究中不斷涌現的新的學術成果，新的思想方法，以開闊自己的視野，更新自己的知識。1933年他曾應邀赴英國講學，在英國拜會維特根斯坦，對維氏主張的思維方法頗有興趣。1934年他離開英國，轉道進入蘇聯考察，又赴布拉格參加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回國後，他先後寫成《游歐洲印象》、《在蘇聯所得之印象》、《在英國所得之印象》、《新三統五德論》等在《北平晨報》發表，《新三統五德論》一文表明他的思想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為此，國民黨政府逮捕了他，後由何應欽電示才從保定獲釋。馮友蘭在三、四十年代並未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但他在寫作《中國哲學史》、《新事論》等著作時，確曾借鑒過唯物史觀的一些原則和方法，這使得三十年代學術界認為他的《中國哲學

^①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第32頁，1948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

史》的優點中，“最可注意的一點即此書是很能運用唯物史觀的。”^①馮友蘭注意吸收新的學術成果和思想，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他以中西互補，古今融會的方式發展中國文化的主張，這種主張使他自己的學術思想不拘一格，求新求變，這在五十年代以後表現更為明顯。

五十年代以後，馮友蘭的學術活動是在對新理學的自我批判和反省中起步的，這種活動的結果使他在1959年出版了《四十年的回顧》。這一時期他還以新的觀點和方法撰寫了大量的中國哲學史論文，在1958年，1962年，先後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並從理論的層面探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1960年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1962年出版新編第一冊和《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1964年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他把新編看作自己學術思想根本轉變的標志，看作自己新的學術生命的開始，在新編的題詞中告訴人們：“此關脫胎換骨事，莫當尋常著述看。”從三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到六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的學術思想不斷變遷，變遷中在不斷吸收新思想，增添新內容，但他通過研究哲學史，探討中國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這一旨趣並沒有改變。這使得他的思想在變遷中規模日益弘遠，內容益趨完善，他對於復興中華文化的信念也日漸篤實。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激烈批判，他纔一度停止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

（三）意寄三松 心懷四化

文化大革命十年，馮友蘭同廣大知識分子一樣，不僅身心遭

^① 張季同：《馮著〈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和讀法》1934年《出版周刊》126—127號。